我曾在西沙拍戏

俞亮鑫

南海，近来一直牵动着亿万中国人的心。我曾到过这片遥远而又美丽的海域，那是1997年10月，我随着影视片《海之魂》剧组前往西沙群岛采访。当乘坐海军舰艇由榆林基地驶向南海，只见晚霞映红了碧海蓝天，海面上波光粼粼，不时有成群飞鱼从水中跃出，似与舰艇比快，鱼群腾空飞翔，轻轻掠过海面，溅起点点浪花，场面十分壮观。

次日拂晓，舰艇渐渐靠上永兴岛码头，这是南海诸岛最大的岛屿。晨光中，海面珊瑚斑斓，云卷浪舒；岛上郁郁葱葱，林密树高。一首《西沙，可爱的家乡》旋律顿时出现在我耳边。登岛后，我即顶着热带骄阳，汗水涔涔地去找1946年竖立的“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”，碑刻“南海屏藩”四个大字，水泥碑仅一人高，十分简朴，但这是二次大战后我国收复西沙及南海诸岛主权的铁证。

岛上有片100多位将军先后栽种的“西沙将军林”，有些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栽种的，他们均在树上刻下名字。足见南海这些海岛的分量那时在祖国心中有多重。我至今还珍藏着在“西沙将军林”和“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”的留影。

更难忘的是，在西沙群岛，《海之魂》剧组让我客串了西沙群岛某水警区司令员一角。当时，部队官兵有保密需求，渔民又被烈日晒黑，能够客串这角色的唯有我这个随行记者。当导演推荐我扮演司令员时，我甚为吃惊，连连谢绝。但拗不过何政军、翟乃社、姚安廉等主演相劝，最终戴上大盖帽，穿上海军服，扛着两杠四星大校军衔，硬着头皮走上镜头。首场戏是我带领一批军人走向指挥部，由于步子不像军人，竟反复拍了八遍。这热带海岛既热又湿，弄得满脸是汗，化妆师忙不停地为我抹去汗珠……此刻，我最敬佩的是那些头戴钢盔、顶着北纬17度线直射烈日，在美丽珊瑚岛上巡逻的海军战士们，其步伐雄壮，威震南疆。

《海之魂》先后在永兴岛、石岛、七连屿等岛礁一连拍了三天。上七连屿，剧组被大片美丽灿烂的珊瑚、海石花所阻。为了保护环境，剧组只得在齐胸深的海中涉水上岛，惊飞了一群海鸥、白鹭。有意思的是，岛上战士见我军官打扮，还主动向我立正敬礼。这使我受宠若惊，不敢当真，紧张地连连说：“我是剧组的，不是真的！”闹得剧组上下哈哈大笑。

在西沙群岛部队欢迎会上，西沙群岛驻军的康司令员和我这个“假”司令员碰了杯。我对他说：“对不起啊，这些天，我都在假冒你……”康司令员说：“这是工作需要嘛，谢谢你们宣传我们守岛军人。”通过交谈，我才知晓，在远离祖国大陆的西沙，守岛官兵克服了缺乏淡水、缺乏蔬菜以及高温、高湿、高盐分、高日照等困难，以岛为家，乐在天涯。淡水断了，就用雨水净化而成，精神实在令人感动。在永兴岛战士俱乐部，阅览室中只有两份报纸：解放军报和新民晚报。报纸送到这里，时隔已近一月，报纸一到，战士竞相阅读。听到这里，我真想为守岛官兵行个军礼！当然，拍摄这部戏，就是一种致敬。

记得离开西沙群岛，我和几位主演乘坐的是军用直升机。机上隆隆轰鸣，说话无法听清。但鸟瞰海面，西沙群岛像一颗颗翡翠，镶嵌在蔚蓝色的茫茫南海上。尤其是七连屿这珊瑚岛礁，犹如一串七彩的珍珠项链。

南海，我心中最美丽的海！在那里，有一群乐在天涯的守岛人！

老上海的公园

朱争平

朋友很少见面，见面感觉特好。吃酒喝茶扯淡，过后却都忘了。 老树 作

公园是城市发展到具有一定文明程度和承载能力时的产物。在近代中国整个城市公园发展史上，上海是最为重要的城市。老上海城市公园的变迁，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近代中国城市公园的发展。

上海开埠后，在上海的西方人为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，把西方的公园文化带到了上海，开始在上海建造公园。1868年（清同治七年）建成的英美租界公共花园（今黄浦公园），是上海也是中国的第一座城市公园。此后租界当局先后在上海共辟建各类公园，其中包括休闲公园、体育公园、儿童公园等20多座。今天的中山公园（时称积司非而公园）、复兴公园（时称顾家宅公园）、鲁迅公园（时称虹口公园）、襄阳公园（时称兰维纳公园）等都是富有特色的租界公园。租界公园纯粹是为外国人服务的，拒华人于园门外长达半个多世纪。公共花园当时甚至规定“华人与狗不得入内”，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愤慨。经过60多年坚持不懈的斗争，上世纪20年代，租界公园才被迫向中国人开放。租界公园的兴建，当时虽然对中国人民是一种精神戕害，但客观上使上海近代城市公园建设进入最初阶段。

1882年，受租界公园的影响，上海一些开明商人以股份公司的形式集资建造了兼具公园、游乐场、餐饮等多种功能的申园。申园开放不久即门庭若市，获利丰厚，于是群相效仿。此后，张园、徐园、愚园、大花园、西园等纷纷建成开张，使上海城市公园建设进入“营业性私园”的鼎盛时期。这些私人集资修建的园林花木扶疏，山水相映，楼堂耸立，游乐餐饮设施及服务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。营业性私园面向大众开放，不分种族、性别、地域和职业，人人皆可入内，使中国人终于有了自己建造的“公园”。

民国时期，随着上海华界统一、行政区域逐渐扩大和近代市政管理制度的开始建立，上海华界市政公园建设在政府的主持下进入高速发展期。上海市立园林场风景园、上海市立第一公园、上海市立公共学校园、上海市立动物园、上海市立植物园等数十座风格多样、功能多元的公园先后建成开放。同时，一批乡绅、富商受近代园林意识的影响也纷纷出资修建公园，免费向公众开放。如军工路纪念公园、高桥公园、中山林公园等。1929年上海特别市市政联席会议通过的《关于开辟和建设上海市市中心区域的意见》中，将园林等空地的配置纳入到了市中心区域建设规划中。这是世界城市公园系统思想在中国的最早体现，在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和园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。与此同时，上海群众绿化活动和园林花木业的发展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国民政府确定每年孙中山逝世纪念日（3月12日）为植树节。上海市政府举行的第一届植树仪式，市长和各界代表2000多人参加。市政府规定植树节前后一周为“造林宣传周”。在日军侵占上海前，历年均举行此类仪式和活动。

老上海的公园不但继承与拓展了传统园林文化，而且有益吸收了西方近代园林文化，呈现中西合璧的海派特征。租界公园整体风格主要为西式，但也融入了中国风味，如中山公园、复兴公园内多有中国园。营业性私园以中式传统风格为主，同时也运用了西方园林要素。民国后所建的市政公园，进一步吸纳融合了西方园林的特点，大都为西方规则式、自然风景园和中国传统园林的综合体。

“八·一三事变”后，上海市政府辖区公园及私有园林大多被毁，租界公园部分受损。上海市政公园绿地建设遭到毁灭性破坏，进入衰落期。至1949年，上海市郊保留比较完好的公园只有10多座。

上海解放后，上海城市园林绿地建设迎来了新的春天。至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，上海新建、改建和修复的公园增至50多座。“文革”中，上海园林绿化建设遭到严重破坏。改革开放使上海园林得到新生。上世纪90年代后，上海的公园绿地建设得到超常规发展。目前上海已有各类公园近200座，城市森林覆盖率达到15%。广大市民有了更多的休闲娱乐场所和更广阔的绿色空间。

回顾上海公园的历史变迁，对于我们全面了解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，珍视今天的城市生态，进一步拓展城市公园绿地的建设不无意义。

永远的红烧鲫鱼

徐亚斌

由于工作原因，我不在母亲膝下，每个节假日的首要安排总是回家看望她老人家。每次回家的第一顿晚餐，必须得由母亲亲自掌勺。餐桌上的菜肴定然丰富多样，而红烧鲫鱼也一定会赫然在列。母亲知道，她的老儿子，从小就特喜欢吃鱼。虽然我和哥很多时候会利用课余时间去摸鱼、网虾、捉螃蟹，但解馋的机会少之又少。那时家里穷，哥俩就把这些“战利品”卖给来岛上插队的上海知青，换回有限的几个小钱，买一些必须的学习用品。有时候我看抓得多了，就露着几分馋相，央求母亲留出几条烧了吃。每每在这个时候，母亲就很为难。只见母亲的手在养鱼的篓子里不停地拨拉，迟迟下不了决心。最后似乎是发了狠心，挑出几条相对小的，给我们做红烧鲫鱼。红烧鲫鱼后来也就成了母亲烹饪技术的保留节目。

自从我离开海岛的那年起，每次回家的第一顿晚餐，便是全家的团圆饭。父亲走后，母亲就再也没喝过酒，但家里的规矩没变。每次在知道我回家的日期后，母亲总要亲自上街，挑选上好的野生鲫鱼，准备她特别看重的晚餐。后来，母亲老了，不能亲自上街买鱼了，我回家的次数也更多了，并告诉她，老儿子在外面什么都有得吃，劝她不要再为那顿“团圆饭”操心了，老人执意不肯，总是要事先催问打听我回家的确切日期，责成哥哥上街去把鱼买回来。

岁月流逝，母亲的衰老确乎在加快。又是一年的春节，我回家看望母亲，哥、姐他们正巧都有事不在家，回家的第一顿晚餐破例只有母亲、我和我儿子三人吃。当我又一次品尝母亲的红烧鲫鱼时，心头掠过一丝伤感，那特有的美味没有了，整个一盆热腾腾的红烧鱼，咸苦得舌头发麻。为了不让母亲看出什么，我对儿子使了个眼色，父子俩一个劲地夸鱼的味道好。可以看得出，母亲很满足。但这份满足仅仅停留了不到半分钟，在母亲亲口尝过后，刚才的满足便荡然无存，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茫然和歉意，像做了错事的小学生。看着母亲满头的白发和茫然的神情，我的心被揪紧了，两行热泪潸然而下……

母亲活着的最后那个国庆中秋双节，我回了家，母亲端坐在院子里等着我。年迈的母亲终于再也无力张罗晚饭了，我想也一定不会再有红烧鲫鱼了。然而很出乎我的意料，晚饭上菜的时候，姐姐最先端出的正是这道菜，并告诉我，是母亲特意关照做的。吃着姐姐做的红烧鲫鱼，我的心情极为复杂，尽管鱼的味道远不如母亲亲自烹制的好，但我同样吃得有滋有味，我依然是在咀嚼着深深的母爱呀……

现在，母亲走了，她是随着那场百年不遇的大雪一起飘逝的。但母亲的红烧鲫鱼却一直香在我的心里……

小仓鼠保卫战

（新加坡）王文献

小宝同学多次提出想买个宠物，期望值从小狗到小猫到小仓鼠。向来有求必应的二十四孝老妈却犹豫不决，无他，怕看到她不舍小动物们离去的哀伤。

然而有一天，我外出回来，她提着一只漂亮的笼子，里面有两只活蹦乱跳的小仓鼠，兴高采烈地告诉我爸爸买给她的！既然已经买来了，我便嘱咐她，好生养着。她说宠物店的店员告诉她，这是一对儿，不久之后就会生出很多的仓鼠宝宝。我惊出一身冷汗。

未等仓鼠宝宝出世，这两小东西就趁我们不备，在笼子里自相残杀，结果一死一伤。小宝难过至极，流着眼泪把死的埋了，伤的带去宠物店医好。劫后余生、没有朋友的小仓鼠，居然有滋有味地活了下来。

但不久前的一天晚上，我有事在外，小宝连环call我，声音颤抖地告诉我，小仓鼠病了，不吃也不喝，躺在笼子里，呼吸都很微弱了。我一时走不开，她爸爸便和她一起带小仓鼠去宠物店，店员遗憾地说，病得太严重了，只能等……

面对一个孩子，他无法说出那个“死”字，但小宝明白了，哭着打电话给我。我心急如焚赶到家，看小仓鼠衰弱的样子，估计是熬不到第二天早上了。所有人都泄气了，只有小宝不放弃，她在互联网上找到一家仍未关门的兽医诊所，富有爱心的兽医小姐居然愿意推迟下班时间，等我们把小仓鼠送过去。检查、喂药、喂水、喂食，兽医忙了大半个小时，小仓鼠看上去好像活泛了一点儿。兽医说，能不能熬过今晚，就看我们回家之后如何照顾它了。她列了一个清单给我们：每个钟头喂水一次，每两个钟头喂食物一次，每三个钟头喂药一次。要感谢我们的菲佣，那一夜，她几乎没睡。第二天早上我们离开家时，小仓鼠在安睡。一天里，一有空我们就打电话回来，女佣说，小仓鼠越来越有精神了。到了下午，我下班回来，给它喂药的时候，它居然伸出小爪子左挡右挡，拒绝喝药！一个星期后，它彻底康复。

倾尽全力去救它，只因它是一条小生命，还因它是小宝同学的宝贝。

我的南业大

方鸿儒

“呵，我的南业大，总算毕业了、熬出头了，想起来真是往事不堪回首……我竟自怀疑起来：为了它——一张所谓的‘大专文凭’，付出的代价是否太大了？

作为儿子，我虽慰藉了父亲的早年心愿。但作为父亲，却又放弃了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我可以不在乎别人的冷言冷语。但当你意识到在这‘文凭’里，有着儿子为你作出的牺牲，你能不问心有愧么？

夕阳西下，别人家的父母欢声笑语地牵着孩子的小手回家，而我却无奈地把儿子送进没有父母陪伴的地方。夜晚，我成了世上最孤独的人。除了能令我心归静处的教科书的陪伴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东西能让我在灯下守护着那微茫的希望。

而生活的逻辑就是这样：你想得到一些，必将失去一些。你想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你只能承受各种压力。

但每当我走进教室，我的心情就会平复而舒坦开来。日里的烦恼，夜间的孤独，便在与同学们相互间热情的交谈中化解了……”以上文字摘自笔者1984年7月写的“毕业小结”。桑榆晚景，便想着要清算人生。这份“小结”便是当年的草稿残篇。

1979年春我随着“知青大返城”潮流，从大庆师专退学回沪后，为了补读文凭，便于1980年秋考入了原南市区业余大学。又因为刚返城，住房条件差，便与妻暂时分居，儿子只能在托儿所“全托”。

我们当年的学友几乎都是“老三届”回沪知青，不少人还在街道生产组上班。我们不缺人生的历练，缺的是知识、是“文凭”。我们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于是便相学于业大的课堂。

业余求学是艰苦的。下班后便匆匆赶着去上课，书包里塞个面包就算是晚餐了。云南南路上的小绍兴鸡粥、排骨年糕、猪油菜饭曾是我们的最爱。

说是“业大”，但教材绝对是“全日制”的。老师也绝对是尽心尽责、有水平的。夏允贻、王禹之、程镇飞……都是我们尊敬的师长。

不要说那一纸大专且是“业大”的文凭无足轻重，三十年前它确曾改变过我们中许多人的命运！

三十年来，我谨遵师嘱，在写作园地上辛勤耕耘，写了近千篇杂文、随笔、书评、股评，发表了近百万字的作品。

三十年后的今天，我应该有资格和程老师“分享喜悦”。凭借着南业大苦读的扎实功底，我在华师大中文本科自考中顺利过关，保住了执教高中语文的饭碗。

是的，如果说北大荒的暴风雪锤炼了我的意志和性格，那么南业大的苦读生涯则赋予了我追求美的灵魂与想象的翅膀。我向她——我的南业大，我的最后一所母校表示深深的敬意……

十日谈

毕业季

明日请看一个少女的初中毕业情思。